

# 反對派故態復萌不可救藥

□姜桂興



議論風生

按照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和選舉程序，新一屆香港特區立法會的18個事務委員會舉行了正副主席選舉。選舉中反對派故態復萌，對外向建制派大要輸打贏要的伎倆，對內則爭鬥不休，實在是不可救藥。

**一、反對派輸打贏要，缺乏起碼的政治道德和風度。**在18個事務委員會中，15個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選舉是按照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的協調結果進行的。既然反對派政黨參加了協調，就沒有理由對這15個事務委員會的選舉結果再提出異議，進行指責。在政制、司法、交通等3個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人選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共識，因此這3個委員會的正副主席是按照立法會的選舉程序選出的。參加選舉就必然有輸有贏，只要有關選舉是按照規則和程序進行的，無論是誰都應該尊重選舉結果。但反對派中有人就是輸不起，例如劉志輝在政制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中以11票對23票敗給譚耀宗後，在該委員會的副主席選舉中又以10票對23票敗給謝偉俊。選後劉志輝對投票結果非常不滿，不顧有4個事務委員會的主席、8個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由反對派議員擔任的事實，指責建制派「霸晒」所有主席，明顯是輸打贏要，缺乏起碼的風度，實在是招人恥笑。

二、立法會事務委員會選舉反映反對派內部的裂痕繼續存在，一盤散沙的狀態難以改變。在今年9月舉行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人民力量與民主黨鬥得不亦樂乎，在這次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中這種爭鬥繼續上演。例如，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20位委員中，除未出席會議的黃毓民外，其餘的19位委員中有10人屬於反對派，9人屬於建制派。理論上講，如果反對派各黨派團結一致，則該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將都能由反對派議員擔任。根據事先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的協調，該委員會本年度的主席將由反對派議員擔任，副主席則由建制派議員擔任。因此在該委員會的上屆主席、人民力量的黃毓民表明將會競逐連任之後，民主黨等反對派政黨堅持要派出資訊科技界新晉議員莫乃光參加該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明顯是要反對黃毓民繼續擔任該委員會主席。由於包括新主席葉劉淑儀在內的多名建制派議員均不支持新人首年擔任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傳統原則，選擇支持黃毓民，最後在不記名投票下，黃毓民以11票擊敗只獲7票的莫乃光。

從反對派在這次小小的選舉以及本港近年舉行的多場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中的表現看，雖然他們「民主」、「自由」等冠冕堂皇的政治口號喊得很響亮，但始終是斤斤計較於一些蠅頭小利，缺乏起碼的政治道德水準，離成熟的政治團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從這個角度來看，反對派要上台執政也是不現實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泛政治化衝擊香港發展

□蘇偉文



宏觀微觀



蘇偉文

香港土地資源珍貴，這是一種經驗，也是一種共識。港英時代土地開發以填海為主，那時沒有太大的環保訴求，填海造地是一種很自然的想法。而現在填海已變成環保團體的頭號反對議題，而發展新界作新市鎮，也受到各方的阻撓和衝擊，令政府在土地發展上困難重重。

發展新界本來是前朝定下來的方針，當時不僅沒有多大的反對聲音，反而受到各方的支持。此舉除了有利經濟之外，更可以騰出土地興建公共房屋，以紓解一直以來公共房屋覓地的困難，在規劃上新市鎮可以在沒有包袱負擔的情況下進行，對社區配套可以有較周詳的考慮。更重要的是發展新界是一項多贏之局，因為新界可發展的土地比較大，容易產生群體效應帶動發展。所以發展新界土地是多方有利的事情，市民的土地使用有了多重的好處、興建公共房屋有了着力點、土地流動量加快、社會經濟有了進步，人們所得和機遇都會有得益，在經濟方面看，發展新界是一個德政，實在沒有理由拖拉下去。

發展新界早在回歸之後便被提出，在過去已有兩輪的諮詢，政府亦已對收集的意見作出整理，在諮詢上已做了要做的功夫。或許有人會說，現在的局勢不同了，

政府需要多些和各方持份者接觸，以做到令施政得到認同，即是諮詢是依足程序，但還是要落力和持份者溝通。可是現在不是政府不想和其他持份者溝通，而是每每在最後關頭才有所謂持份者出現，而這些持份者會以很強烈的訴求來回應政府的建議，是以非黑即白的態度來回應。在發展新界上，這些最近冒出來的持份者訴求，是無迴轉空間的要政府收回計劃，這是一個很不負責的態度，因為假如真的有如如此強烈的不滿，應該在十多年前的諮詢初期提出，而不是到了十多年後才堅持。對政府來說，假如因為這些強烈反對發展的聲音而將新界發展叫停，讓這十多年的努力白費，從而使所有發展計劃都會面臨重大變數，對香港總體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 要政府收回計劃極不負責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發展新界一事上已脫離了平衡各方的分析和妥協，而是以陰謀論懷疑政府的意圖，發展新界會被渲染成割地賣港，以這個思維來看，發展市區也可以是割地賣港，只要有非本地人出現便可將之包裝成割地賣港，中環因為各國籍人士雲集，中環才真的是割地賣港！為什麼又不見反對團體去中環抗議？為什麼又不見反對團體去建議將中環回復舊觀？

近來一股凡事泛政治化和陰謀論式的思維，正衝擊着香港的發展，香港已蹉跎了十五年的光陰，再如此下去，真不知香港會怎樣。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國際關繫

# 韓國應遣送劉強回中國

□李進秀

因對日本駐韓國大使館投擲火種而被判刑的中國年輕人劉強，十一月初即將刑滿出獄。但圍繞他出獄後去向問題，成為中日韓三國爭議焦點。日本以劉強為「逃犯」之由，卻將其引渡回日本審訊；中國政府則認為，劉強已在韓國服刑完畢，應當獲得「回家」的人道待遇。

顯然，對於韓國政府而言，這是一個近乎「兩難」的棘手問題。但不論是從人道主義，還是國家利益角度而言，韓國都應該遣返劉強回中國。若貿然滿足日本人的要求，儘管能獲得短暫上的日韓「友誼」，卻會嚴重影響中國人民對韓國的感情，更會衝擊韓國在半島問題上種種努力，後果將不堪設想。

事件中的主角劉強，月中剛滿三十八歲，曾在廣州市做英語講師和心理治療師，去年十月為了幫助日本大地震受災民衆，在日本當地做了許多義務工作。

據韓國媒體報道，日本指控劉強於2011年12月26日於靖國神社門上放火。後來再於今年1月8日在首爾的日本駐韓大使館扔燃燒瓶。在警方調查的過程中，劉強憤怒地表示：「都已經過了60年，日本政府非但不承認歷史，也沒有任何負責任的意思，對此我很憤。」當地媒體還披露，劉強家庭飽受日本殘害，例如其外曾祖父因抗日被拷打至死，他的外婆被日軍帶到中國南部當慰安婦。

## 日本施壓其心昭然若揭

雖然劉強在韓國提出上訴，但遭到駁回，在完成法定刑期後，預計下月初將正式出獄。本來這是一件非常輕微的案件，今年五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裁判部，在判決時也表示：「犯罪未遂，沒有造成特別損失」，做出了判監九個月的寬鬆處罰，這足以說明了問題。

但日本當局出於種種理由，過去半年來出動最少六次「外交努力」，試圖將劉強引渡至日本受審。而其所依據理由是：劉強為日本追捕的「逃犯」，根據《韓日罪犯引渡條約》，韓國有義務按日本要求引渡劉強。事實上，日本之所以要如此費盡心機，並非單純的「破案」需要，因為從無罪推定原則，並沒有充分證據將劉強定罪，就算引渡成功，最終也必須將劉強遣返回中國。

日本當局實際上是希望藉「引渡中國罪犯」、「判刑」的身，來「維護靖國神社的神聖地位」、「警告中國人不得褻瀆神社」。

據悉，日本政府為達到這一目的，出動了大量外交手段。甚至包括，藉本月八日韓國國會議員和商界人士組成的「日韓-韓日合作委員會」第48屆聯合大會舉行之際，由前首相麻生太郎親自率團訪韓，與韓國各有關部門會商，以「促進引渡劉強問題的解決」。

不可否認，案件發生在韓國，韓國政府有理由按自己國內的法律及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去自主解決劉強引渡問題。但對於韓國政府來說，不論是從法律本身、人道主義原則，還是國家利益角度而言，將劉強送交日本都是極其錯誤的做法。

首先，日本當局並沒有充分引渡的依據。根據二〇〇二年五月生效的《韓日罪犯引渡條約》規定，韓日兩國將向對方引渡根據本國國內法判處「死刑、終身監禁以及1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請注意，當事人劉強在韓國僅被判處九個月，並沒有達到一年的期限。換言之，即便根據這一條約，韓國也沒有必要遣送劉強予日本。而日本當局其實是明知如此，刻意淡化劉強的具體刑期。

## 引渡條約並不適用劉強

其次，強行遣送劉強到日本，不僅不人道主義精神，更違反韓國長期以來堅持的歷史原則立場。一如媒體報道，自日本當局企圖被曝光後，韓國社會出現大量反對聲音。韓國民間組織「太平洋戰爭遺屬會」在今年八月首爾高級法院進行請願。而韓國民族英雄尹奉吉的孫子更對媒體指出：「劉強不是單純的刑事罪犯，而是一名政治犯，不應該將其引渡往日本，而應將其遣返回中國。」試問，如果強行遣送劉強，韓國今後對日本的歷史原則是否也需要作出改變？當韓國不斷批評日本歪曲歷史之時，卻同一時間容許日本以遣返犯人的名義去「維護靖國神社的神聖地位」，這豈不是精神分裂的做法？

最後，從國家利益角度考慮，強行遣返劉強到日本將是一場外交災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月中曾明確指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有關案件」、「我們希望韓方公正妥善解決有關問題，保障相關中國公民的正當合法權益」。此外，像今年年初駐韓張鑫森大使向外交部當局要求對劉強妥善處理、今年七月訪韓的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也與外交部通商部部長長星煥、法務部部長權在珍會晤時談及了有關劉強人身問題。這已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強烈立場與要求，無視友好鄰邦的正當要求，這對兩國關係發展豈會有益處？一如內地有博客指出的那樣，如果韓國讓日本滿足了需要，將引發中國推出對韓國的連串反制措施，後果將不堪想像。

中國尊重韓國的自主立場，正因為如此，才一直強調希望以「人道主義」遣返劉強回中國。韓國政府理應權衡利弊，是向日本屈服，還是向歷史致敬，只能兩者擇一。當然，一如韓國當地媒體所分析的那樣，一個「兩全其美」的做法是，以劉強為「政治犯」為由，遣送出境。這樣做最符合韓國本國利益與外交需要考慮。

# 十八大闡述「中國道路」

□陶文鈞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處在一個重要的新節點上，「十八大」將是一次繼往開來的重要大會，國外對於「十八大」對上述問題的闡述正給予高度期待，尤其是「十八大」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進一步闡述。「十八大」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眾論



陶文鈞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即將舉行。這既是一次中國共產黨例行的五年一次的代表大會，又具有非同一般的歷史意義。這裡筆者想通過自己與外國學者的接觸，通過閱讀外國政要與學者的評論談一談國際上對「十八大」主要關注點是什麼。

## 換屆制度化 有利於穩定

首先是領導人的換屆。現在，中共和中央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通過兩屆黨代會更換一次已成制度。一些外國學者談到，鄧小平所倡導的廢除幹部任期終身制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而且鄧小平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為全黨樹立了榜樣。通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已逐步完善了這個制度，從而保證了不斷有優秀的、年富力強的領導人補充到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崗位上來。有的美國學者談到，現在中國在這一方面的制度比美國好。第一，有利於穩定。一般說來，中國在五年前已經基本選定了領導人，接下來的五年是一個過渡時期。老百姓可以早早就到心中有數，有可預測性；第二，有利於工作。美國總統任期一屆四年，實際上到了最後一年，總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爭取連任了，如現在奧巴馬那樣；第三，節省開支，美國選舉簡直是燒錢。今年，由於薄熙來事件，在這方面激起了一點漣漪。但國外的議論並

不特別多。在90年代，許多國外智庫都在討論「鄧以後的中國」；本世紀初，又在討論「江以後的中國」，現在則沒有多少類似的議論。

## 保持快增長 有利於經濟

另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是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在「十六大」上提出了「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命題。本世紀的頭十年是中國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全球化，中國入世；美國聚焦反恐；中國睦鄰政策收到成效），現代化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回過頭來看，更感覺「戰略機遇期」的提法的英明。惟其如此，中國的發展道路（許多外國人稱之為「中國模式」，其實中國自己倒很少有人用「模式」這個詞）也越來越引人注目，在西方還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國外一個非常關注的問題是「十八大」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進一步闡述。「戰略機遇期」指的是本世紀的頭二十年，已經過去了十二年，接下來的八年還是不是機遇期？戰略機遇期的國內外環境是否還繼續存在？在世界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國如何保持這個機遇期？如何把「科學發展觀」與機遇期更好地結合起來，既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又繼續保持較高水平的增長？中國將如何在下一個五年推進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所有這些，國外都是非常關心的。尤其當前，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普遍乏力，有的金磚國家也出現了增長減速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對世界經濟的意義更顯重要。

再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的和平發展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進而提出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十七大」上又宣佈要「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它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導得了有利的國

際環境，尤其是周邊環境。但也毋庸諱言，近兩年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安全環境變得複雜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越來越變得像典型的現存大國與新興大國的關係，按照有的國際政治學者的說法，它們之間有着天然的競爭關係；即使是比較樂觀的中美兩國的學者，以及其他國家的學者也都注意到，它們之間的競爭性因素突出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爭議，包括領土、領海、海洋權益的爭議突出了。有的外國觀察家質疑中國是不是還堅持和平發展，是不是還堅持睦鄰政策。有的對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多有指責，批評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不透明」。

## 續走和平路 有利於世界

在變得複雜的安全形勢下，中國如何堅持和平發展？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走出一條新型的大國關係的道路？中國一方面要捍衛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一方面又要堅持和平發展，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國際上普遍期待着「十八大」給予進一步的闡述。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兩岸關係。從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轉折，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這四年多來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的局面已形成。國外有一種議論：兩岸關係中容易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掛得低的果子已經被摘得差不多了，再往後就是掛得高的果子了，要摘就要爬樹、上梯子，就比較難了。大陸的政策是從易到難，從經濟到政治，並創造條件破解難題，進行關於政治和軍事議題的對話。大陸如何來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在台灣，對兩岸政治和軍事議題對話的支持率仍然不高，大陸如何來破解這個困境？大陸是否有足夠的耐心？這些都是國外觀察家經常提到的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 「制度關愛」是最大關愛

□屠海鳴



神州點面

形成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外乎兩類原因：一是主觀原因，由於一部分人自身的能力太弱造成的；二是客觀原因，由於制度設計、權利分化、資源壟斷、市場機遇等因素造成的。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剖析弱勢群體形成的原因，不難看出，第一類弱勢群體由於自身參與競爭的能力太弱造成的，之所以能力弱，又往往是由於生理上的原因。比如，殘疾人、病人等，這類人可稱之為「生理性弱勢群體」。第二類弱勢群體則主要是由於某個階段、某個區域社會公平正義的缺失、或其他特殊的社會原因，導致的難題被放大，這類人可稱之為「社會性弱勢群體」。

與「弱勢群體」概念相對應的是「強勢群體」。不可否認，那些在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以及社會資源上，明顯佔有較多的人群就是強勢群體。眼下，所謂「官二代」、「富二代」已經成為強勢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顯然，理想的社會結構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因此，弱勢群體、強勢群體的比例越小，社會就越和諧，人們的幸福感就越高。無論是縮小弱勢群體、還是強勢群體在整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下降，都應該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着力點。

以往，我們專注於經濟發展，在幫扶弱勢群體上沒有進行過很多探索。10年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題下，幫扶弱勢群體有了更多制度性的安排。「弱勢群體」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人吃五穀糧糧而生百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事例屢見不鮮，而農村居民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從

編織起了一張防止社會成員淪為「生理性弱勢群體」的「安全網」。

## 為弱勢群體編織「安全網」

「生理性弱勢群體」需要用制度化的安排進行關愛，「社會性弱勢群體」同樣需要用制度化的安排得到關愛。媒體曾報道，安徽省渦陽縣72歲的環衛工人李顯梅，在兒媳離家兒子入獄之後，每天凌晨載着6歲的孫女掃大街，由於老人年事已高，被保潔公司辭退，使老人和孫女的生活陷入困境，後來，政府部門為李顯梅及其孫女辦理低保與救濟，每月可領取900元救濟金，比原來做環衛工人的收入還高。事件讓我們看到，低保等民政救濟的制度，也讓那些因社會問題陷入困境的民衆獲得關愛。

一個社會有沒有溫暖？民衆有沒有幸福感？應該不是看強勢群體的看法、中間群體的體驗，而是看弱勢群體的感受。不是看弱勢群體一時一地的境遇，更重要的是看他們在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能不能通過制度上的安排得到救助。只有制度關愛才是最大的關愛。

今天的中國，處於一個大規模的、急劇的多重轉型過程當中，這樣那樣的問題層出不窮；但我們欣慰地看到，對弱勢群體的關愛越來越走向制度化的軌道，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這都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作者為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